

小品文選

第一集



福建人民出版社

小 品 文 選

第 一 集

福建日報編輯部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小 品 文 選

福建日報編輯部編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河東路得貴巷)

福建省書刊出版業

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泉州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福建分店發

※

書號0189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 3/4 5

1955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56年3月第3次印刷

印數10,141—20,160 定價一角六分

目 錄

談小品文.....	(1)
高樓上的工作組.....	(4)
笑和哭.....	(7)
難怪羣衆不滿意.....	(9)
被「退」回去的人.....	(11)
一個不會算賬的農場.....	(13)
王醫師.....	(15)
劉主任的報表.....	(18)
拖了二十個月的案件.....	(20)
趙站長和他的「雙邊合同」.....	(21)
見火不救的人.....	(24)
奇怪的放款原則.....	(26)
王廠長的計劃觀念.....	(27)
好壞搭配.....	(30)
官僚主義與盜竊犯.....	(32)
這樣的「靈活掌握」.....	(34)
這是什麼作風.....	(36)
穿不進去的鞋子.....	(38)
不能控制舌頭的人.....	(40)
綠米的教訓.....	(42)
咫尺與天涯.....	(45)
「看旱」的人.....	(47)
「撲克迷」.....	(49)
黃老師的「勞動教育」.....	(51)

談小品文

夏衍

四月十八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陳緒宗同志的一篇介紹蘇聯報紙經驗的文章——「小品文——進行思想鬥爭最靈活的武器」。他用許多生動而具體的例子說明了小品文在蘇聯人民生活中所起的巨大影響，它在人民羣衆中所具有的極高威信，和蘇聯的黨和人民對這種文學形式的重視。這篇文章的結尾說。「我們中國報紙上的小品文雖然有過一些，但還不夠多，這同我們報紙上批評和自我批評開展得不夠是有關的。我們應該加強批評和自我批評，開展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因此小品文這樣一個鋒利的、靈活的、思想鬥爭的武器有必要在我們報紙上加以大大的提倡。我們應該用它作武器，來向一切反面的、腐朽的、阻礙進步的東西展開進攻，爲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掃清前進的道路。」我完全同意這種看法。

小品文，也許有人認爲是一種新的文體，其實，我們過去習用的所謂雜文或者雜感一類文章中有很大大的一部分就是小品文；而雜文或雜感，則自從五四運動以來，早就是我們進步文學向各種反動思想進行鬥爭的一種最有力最有效的武器。從「新青年」上的「隨感錄」，「中國青年」上的「雜評」，「政治週報」上的「反攻」，一直到瞿秋白的「亂彈」，魯迅的雜感，都是用這種匕首和投槍式的短文，和敵人進行猛烈的鬥爭，「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魯迅：「小品文的危機」）。我們思想戰綫上最優秀的戰士——譚代英、蕭楚女、瞿秋白、魯迅都是最卓越的小品文作者，都是最有效地運用這種武器來打擊了敵人的能手。

小品文在中國新聞史上早有了一個光輝傳統，三十年來，

每一個有過報紙工作經驗的人都能體會：小品文是進步報刊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

爲什麼小品文這種文體在五四運動之後逐漸發展而日益爲讀者所喜愛與重視呢？主要的原因是政治鬥爭、思想鬥爭的激化。瞿秋白同志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說：

「魯迅的雜感其實是一種『社會論文』——戰鬥的『阜利通』（feuilleton）。誰要是想一想這將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這種文體發生的原因。急遽的劇烈的社會鬥爭，使作家不能夠從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鎔鑄到創作裏去，表現在具體的形象和典型裏；同時，殘酷的強暴的壓力，又不容許作家的言論採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幫助他用藝術的形式來表現他的政治立場，他的深刻的對於社會的觀察，他的熱烈的對於民衆鬥爭的同情。不但這樣，這裏反映着『五四』以來中國的思想鬥爭的歷史。雜感這種文體，將要因爲魯迅而變成文藝性的論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詞。自然，這不能夠代替創作，然而牠的特點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應社會上的日常事變。」（「瞿秋白文集」第三卷，九七八——九七九頁）

由於此，小品文是戰鬥性的社會論文，但它又不同於一般的政治論文。它是文藝性的論文，它需要文藝素養，它需要幽默才能。

由於此，小品文、即「阜利通」是戰鬥性的文藝作品，但它又不同於一般的創作。它是匕首，是投槍，它的功能是一針見血。它一方面不能夠——也不需要把作者的思想感情從容地鎔鑄進具體的形象和典型，但同時牠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魯迅：「小品文的危機」）

小品文作家應該有哪些條件？應該向哪些方面努力？我以

爲第一是鮮明正確的政治立場，敏銳的觀察能力，——就是一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第二是對階級鬥爭的分明的愛憎，——就是「熱烈的對於民衆鬥爭的同情」，和強烈的對於一切反面的、腐朽的和垂死的東西的憎恨，以及從這種強烈的愛和憎所產生出來的那種情不自禁的、「不能已於言」的真情實感；第三是作爲一個文學工作者所應有的文學素養，精鍊的文體，諷刺和幽默的才能，這之外，假如還要添上的話，那就是還需要有深刻的生活經驗，和廣博的社會知識。

具備了這些，小品文就可以不拘泥於某一種形式。魯迅先生的雜文採用了多種多樣的形式，同樣的達到了給敵人以打擊，給讀者以愉快和休息的目的。可以「現在慣稱的所謂「思想小品」，可以是寓言，可以是對話，可以是獨白，可以是不加任何評論的「立此存照」，也可以用「通訊」和「答客問」的形式。小品文可以使人笑，可以使人恨，可以使人從心底裏激發出對阻礙進步的舊勢力的鄙視蔑視之情。

但是，近年以來，我想每一個當過報刊編輯的人，都會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就是要約請一位作家寫一篇小品文可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文藝作家視小品文爲畏途，推辭惟恐不及，「寫不來」，「怕寫不好」，「容易犯錯誤」，或者更直率地說：「沒有感想」。這原因，除去「同我們報紙上批評和自我批評開展得不夠是有關的」之外，作家對社會上的一切反面的、腐朽的、垂死的東西缺乏強烈的憎惡，缺乏階級鬥爭中的敵情觀念，缺乏那種「不能已於言」的激情，恐怕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有些作家對一切阻礙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對一切社會中仍然存在的惡習、缺點、和不健康現象熟視無睹，無動於衷，或者是偶有所感而也緘口不言，怕負責任。這是缺乏責任感和政治熱情的具體表現，嚴重地影響了批

評和自我批評的開展。我想，在我們提倡小品文的時候，首先就該用小品文這一武器，對我們自己隊伍裏的這種政治上的麻痺和冷淡，展開劇烈的鬥爭。

我們的國家正處在社會主義革命——即社會主義改造的階段，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包含着極其複雜極其尖銳的鬥爭，我們的現實生活中決不缺乏需要用小品文來諷刺的材料。小品文應該成為報刊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替報刊經常地寫作小品文應該是文藝工作者的無可旁貸的責任。我們報刊上不僅要有和應該有魯迅式的雜文，而且要有和應該有果戈理和謝德林式的文藝作品。

高樓上的工作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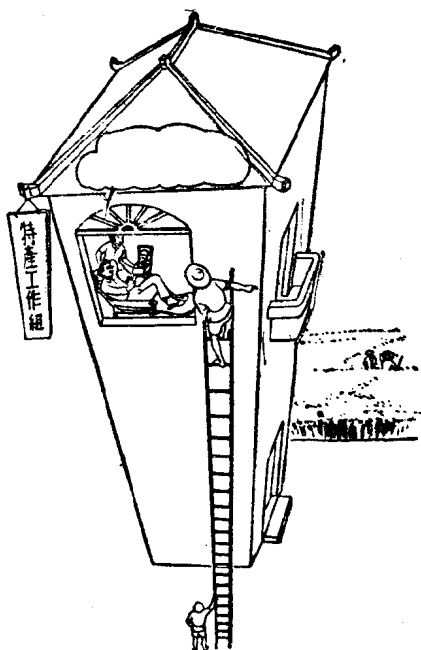
在南安縣鄉間，一座惹人注目的大樓裏，住着一個特產工作組。組長是縣農業技術指導站的吳摩西，組員中有吳的愛人，還有另外的一個女同志。

四月間，他們剛來的時候，本來住在坂頭鄉政府裏邊。但是工作組長嫌人多吵嚷睡不好，飯煮得不好吃，經常嘮嘮叨叨，說什麼「生活為工作之本，吃得好一些，睡得好一些，多做一些工作就補上了」。

有一天，吳摩西像奉了什麼緊急命令似地跑來跑去，要民兵隊長趕快找一座好房子。房子在新步村找到了，是一所嶄新的平房。吳摩西看了一眼：「喲！新倒是新的，可不是洋樓。」回頭又跑到廷陵村找別人想辦法去了。

「同志，我們沒有大樓住怎麼辦？你給想想辦法吧！」看吳摩西當時那種乞憐的樣子，好像離開大樓是沒有辦法生活和工作下去了，村幹部只得設法給他找到了一座資本家住的大的

樓。這一下子，吳摩西很滿意，立刻從五百多里遠的地方接來了老丈母，又借來了留聲機等等，一個快樂的小家庭佈置起來了。從此，吳摩西每天早上跑到四里路以外的泉州浮橋去辦菜——當時豬肉供應緊張，買豬肉要排隊，要等很久，他爲了省麻煩，有時要羣衆替他去買，羣衆不高興去，他還不满意。菜買回來以後，他就忙着下廚房做飯。飯後開開留聲機，或搖船到小溪邊玩玩。上午九點鐘過後，日頭「成虎」，吳摩西就潛居高樓閉門謝客了。



「縣上派我來搞特產工作，水稻問題我不管。」

力 辛 插 圖

當然，一點事情不做，實在也說不過去。與省農業廳工作同志在一起時，吳摩西還配合着做一些事情，到田裏量量甘蔗長了幾寸。但是他很強調特產工作的「特殊性」，強調自己工作的「重點」，不願意羣衆拿這樣那樣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來干擾他。有一次，水稻發生了稻飛蟲，鄉長來請教除蟲和水稻技術改進辦法，他回答說：「縣上派我來搞特產工作，水稻的問題我不管。」五月間，六百九十多畝荔枝樹普遍發生椿象

虫。廷陵等村羣衆主動向他報告虫害情況，要求指導捕虫工作，吳摩西又回答說：「我們是來搞重點試驗的，等搞好重點再來推廣吧！」

但是一等了一個多月，重點沒有消息了，經驗也不見推廣，受災荔枝減收幾百担，有的羣衆質問：「重點搞到哪裏去了？」有的說：「重點設在吳摩西的高樓上。」

高樓，確是吳摩西追求個人生活享受的「重點」，至於工作的重點，不過是他嘴上說說，想用來遮蔽人們的耳目罷了。人們知道，在吳摩西的安樂新居的周圍，廣大幹部和羣衆正在日日夜夜地與害虫作鬥爭，與旱災作鬥爭的時候，區委會三番五次動員吳摩西的工作組參加抗旱，吳總是多方推辭。推不了時，就把「重點」搬出來了：在廷陵村對縣抗旱工作組說：「新步村是重點，我們要到那裏協助抗旱，可以兼做技術改進工作。」回頭跑到新步村，鄉長問他為什麼沒到村裏來，他又說：「我在廷陵村幫助羣衆挖了六天溝。」一個農民聽見了，打量了一下吳摩西說：「吳同志真行，挖了六天溝，你這潔白的手還沒有起泡，比我們還結實哩！」吳摩西知道說漏了，趕快改口說：「我，我是幫助收水費的呀！」其實，他只是複寫了兩張表格。

作為人民政府工作人員，光吃飯不做事，對人民羣衆、對上級都是不好交代的，所以，吳摩西不得不報些假賬。他到處吹噓說，忙得很哩！——忙着寫總結報告。翻開他幾個月來的書面報告便可以看到，他一直在吹噓他是「在以互助合作為中心開展增產運動的原則下，開展特產工作」，不但「沒有存在單純搞本部門業務的思想」，而且「能注意個體農民的特點，進行技術示範及推廣生產（？）……能主動與區鄉幹部聯繫。」

不但如此。爲了向上級報功，有一天，吳摩西把互助組的組員們找來，要他們有的在裝做挑沙改良甘蔗田，有的在裝做採摘大豆的根瘤菌，有的拿着臨時借來的噴霧器，假裝在甘蔗田裏滅虫，……一切導演就緒，吳摩西把照相機的快門輕輕一按，不費吹灰之力，「功勞」就躍然紙上了。

但是，這一切終於被揭穿了。現在，吳摩西等已不得不從高樓上下來，被迫去思索一個尖銳的問題：在人民羣衆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艱苦奮鬥的時候，應該不應該袖手旁觀和追求個人的享受？

（根據蘇紹仁、黃榮顯來稿來信）

笑 和 哭

犁 業

近一個月來，副區長高望陞又感到坐臥不寧了。每逢看到有人從縣裏開會回來，或者聽見區委們在談論整編問題，他就立刻湊上去，豎起耳朵，急切地向人問着：「誰，你們說誰？誰調動呀？我呢，可曾聽說我調哪裏？」有人一次次被問得不耐煩了，就順口胡答應：「你嗎？要調還不是『一百四十一』！」

雖然老高明知道人家同他開玩笑，但是從玩笑中他好像得到了好事降臨的預感。

可不是嗎？——老高滿懷信心地想到：現在工業建設正需要大量人材，我是區級幹部，有好幾年的鬥爭歷史，又是知識分子，工業建設的崗位上正需要我老高這樣的人呢！於是，「鞍鋼」這個激動人心的字眼，不時在他腦海裏翻騰，眼前展開着一副美麗的幻境：聳天的烟囱，工廠林立，電車汽車如

流，舒服的宿舍，還有——當要離開這裏時，會有多麼動人的場景啊：同志們爲自己開歡送會，一場熱鬧的會餐結束之後，大家用羨慕的眼光送自己動身，要好的同志會走近來拍拍自己的肩膀說：「老高，到大城市去，前途無限，可不要忘了老朋友呀！」他老高呢，這時就應該表現得很有「涵養」，應該對同志們說：「反正一樣，到處都是爲人民服務嘛。」老高就這樣常常想得心花怒放，工作也無心佈置了。

可是，過了些日子，老高臉上的笑容逐漸消失，他聽說調去搞工礦企業的多是地、縣委級幹部，這消息像冰水澆在他的心上，老高整整沉默了一個 month。

現在，新的情況發生了：區裏郭區長調到鄰區當區委書記，還沒見派新的區長來。這就像火星掉到乾草上，老高心裏又燃起了新的希望的火焰。他每天打從郭區長房間走過時，常探頭朝窗口望望，心想：「命令一發表，我就要搬到這兒來。看，郭區長在生活上真是門外漢！那張桌子應該換新的了，床舖應擺在靠窗的那一邊……」從此，區裏同志又不時看到高副區長獨自抿着嘴在笑。

黃昏，太陽啣在西山，把半邊天抹上一層金黃燦爛的顏色。區裏同志圍坐在門外的草地上，高副區長正與高采烈指手劃腳地談着自己的計劃：要在這片草地上開闢個籃球場，要開展體育文娛活動，改進學習制度等等。這時，有位同志趁老高高興，同他開了一個玩笑，說：「你不是睡裏夢裏要去搞工業嗎，怎麼來得及顧到這些？」高副區長打着哈哈說：「搞工業固然光榮，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也是國家的需要，既然黨要我在这裏負起責任來，那就要服從革命利益呀！」

高副區長的話聲和笑聲還未落地，區委組織幹事走來了，他像報喜一樣地告訴大家：「上面已正式發表，目前在縣團委

工作的本區人陳采文同志調來當區長了。」

這個消息，在別人聽來是多麼高興，又是多麼平常的事情啊。可是高副區長却好像受了嚴重的打擊，面色頓時陰沉起來，一陣怨忿不平之氣，掠過他的眉頭，在心裏嘀咕起來了：「土地改革時，我在陳采文鄉裏任工作隊長，他不過是個農會主席，現在居然提到我的頭上來了，什麼幹部政策，真見鬼！」想到這裏，高副區長再也按捺不住自己，顧不得什麼個人「涵養」和上級「考驗」，憤然頓了頓腳，星夜趕到縣委會去了。

據看見的人談，這天夜裏老高在縣委書記的辦公室裏談話很激動，要求給他「更重要的工作」和「更大的考驗」，最後甚至哭鼻子了，說什麼再也無臉見本區人民了。但是縣委書記並沒有激動，他只是懇切地告訴老高：等到你學會「忘我」地工作，看到黨的新生力量的成長能夠從內心裏歡呼高興而不是痛哭流涕，黨和人民才能給你更大的責任。

難怪羣衆不滿意

有這樣一個奇怪的糧食收購站。收購站的地址很偏僻，周圍沒有路標，門前沒有招牌，只有一塊同鞋底般大的小紙條，貼在不顯眼的地方，如果不是有意識地走近仔細辨認，你就根本不知道上面寫的什麼。這些條件，再加上沒有向羣衆宣傳，也沒有同有關部門聯系，這個收購站簡直就變成了「世外桃源」。

目前大豆登場，農民紛紛把大豆挑到市鎮賣給國家收購站，他們迫切需要賣得些款回來添置夏秋的生產資料，但是國家的收購站究竟在什麼地方？每天有近百個挑糧的農民爲這件事在穿梭着、苦惱着。

有一天，一隊挑大豆的農民找到了他們熟悉的糧站。

「這裏收購大豆嗎？」

「這裏是糧站，不是收購站」一個糧站工作人員抬頭望了望農民說。

「收購站在哪裏？」

「在區公所後面呀！」他又把頭向區公所那邊一擺，順便應了一聲。

農民把大豆挑起來跑向區公所。奇怪的是連區公所同志也不知道收購站的地址。農民只得再向別人打聽。最後，好容易在一個偏僻的地方找到了收購站，大豆總算賣完了，但是領款處還在另一個地方。於是農民又開始了轉彎抹角的探詢，一連走了一個多鐘頭，還領不到款。農民真是氣極了，有人罵道：「這哪裏是國家收購站，簡直是收購衙門！」

近來，農民普遍忙着夏收，白天很難抽出時間來。七月十四日，某鄉互助組員多人，在下午抽了個空隙挑了數担穀子來賣給糧站。農民等了半點多鐘，一連請了兩次，糧站沒有一個人來接收穀子。當農民再次請求的時候，才有一個糧站的工作人員說：「你們去找基層社呀！」農民聽了轉身跑到基層社，合作社的人員却說「收購糧食是糧站的事情，你們去找糧站好啦」。這樣推來推去，農民不得不找到區公所來。區公所負責同志瞭解情況後，即派了一位同志到糧站去接洽。第一次，在路上碰見協助收購的老陳，老陳聽了區公所同志的反映，翻了翻眼皮看了一下停放在街上的數担穀子，一言不發，轉身就溜走了。第二次碰見糧站的老夏，區公所同志對他說明了來意，老夏皺着眉頭說：「現在已經下辦公，人家都要休息去了，再說天色已晚，根本看不見磅花了，叫他們回去明天再來吧。」區上的同志說：「這些農民等了一個下午，明天他們還要忙着

夏收。要不，你把收購站地址告訴我們一下，我們好介紹農民去找他們。不然羣衆對你們真是太不滿意了！」老夏聽了滿不在乎地說：「一般羣衆當然會罵，管他的，我們收購站不固定，聯繫不上。」說罷竟自揚長而去。

已經夠了，不必再往下敘述了。像這樣的「衙門」制度和「老爺」作風，像這樣冷酷無情地對待國家經濟任務和羣衆切身利益的工作人員，怎能使羣衆滿意？又怎能不令人氣憤？

收購站、糧站、基層社的分工應該明確，而且應該讓羣衆知道；收購站應該從「世外桃源」搬到大庭廣衆中去，工作人員應該從考慮自己的方便改變爲考慮羣衆的方便。最基本的問題就是：要轉變官僚主義作風，加強羣衆觀念。

（根據漳浦縣第六區公所陳旺泉、陳永興來稿）

被「退」回去的人

起 柄

選舉農業勞動模範的工作由縣到區、由區到鄉的佈置下來了。縣區領導上在公文上做了許多「必要的措施」：每次通知都強調要「各鄉重視，選好勞模」；區上還「公平合理」的分配了名額，催促各鄉如期完成。但就是缺少實際的幫助。

何鄉長接到通知，急忙把各村幹部召集起來，把區上分配的勞動模範名額唸了一下，要大家當場醞釀選舉。會場上一時鴉雀無聲，村幹部面面相覷；半天，才有一個說：「這個好搞，在這裏選一選就好了。」另一個說：「我村沒有勞模的影子，向哪裏去選？」這樣七言八語，吵吵嚷嚷，模範沒有選出來，有的幹部溜走了，散了會。

區的勞動模範會議的日期逼近了，區上又下了一道希各鄉模範準時參加大會的通知。何鄉長接到通知，又急急忙忙召開村幹部會議，談來談去，只選出了似模範又非模範的一人，尚差兩名。鄉長說：「無論如何要完成上級分配的三名任務，趕明天出席才對。」但是大家「摸」來「摸」去，再也找不出第二個模範，最後大家想了個辦法：反正明天要有模範去報到，我們再找上一個比較閑的人，一共有兩名也就差不多了。

第二天，各鄉模範都趕到區上來了，區委李指導員親自同勞模握手問好，忽然發現旁邊坐着一位穿着西裝、皮鞋，頭髮梳得油亮的陌生人，就走上前去交談。

「同志，你是哪村的？」

「我是江洋鄉。」

「你鄉勞模來」幾位？」

「來了兩個。」

「是選的嗎？」



無論如何要選三名模範來開會。



——呀！什麼？叫我當勞動模範。
——行！行！
——你沒有事，派你去參加勞模大會。



鄉長看我閑着就派我來。

迪杞編圖

「我父親被選上了，叫我來替他參加。」

「哪一位是誰？」

在旁邊的一位農民聽到指導員問到他，趕忙上來答話說：「我叫陳啓豹。」指導員又問：「你是選出來的嗎？」陳啓豹連忙說：「不，不是，鄉長說我很閑，叫我來開會哩！」

問到這裏，指導員大為生氣，當場就把秘書叫來，吩咐「快把江洋鄉的兩個人退回去」。於是，這兩個趕了三十多里路跑到區上來開會的人就莫名其妙地回去了。

「退勞模」的故事，可以做為有官僚主義工作作風的領導同志的借鏡。

一個不會算賬的農場

去年，順昌縣農場種了二十五畝蘿蔔，剛萌芽不久，大家看到生長得比往年好，就認為準能得到大豐收。於是，不聯繫往年產量，不進行科學的計算研究，就訂出了每畝兩千斤的增產計劃。

蘿蔔收成了，每畝只收了九百二十三斤，除去一切損耗等等，全部淨存二萬零五百斤，比原訂計劃差了二萬九千多斤。但是人工、施肥等全部生產成本已經按計劃一文不少的花出去了。

「在生產上虧了本，總得在出售價格上設法彌補」，該場領導人想到了這個「好主意」，沒有經過任何價格調查和成本核算，就動員了全場十分之一的職工，把蘿蔔運到南平去賣。當時他們主觀的想像是：當地價低，又不好銷；運到南平可以很快脫手，還可以賣個好價錢。